

悬搁的日常化：伦理转向在中国丢的不是理论，是学科感应的能力

你可以「做一次悬搁」，但你不能「栖身于悬搁」——后者已经是对前者的超越

张琼 著 · SDE 学员 · 伦理频道 之3 · 2026年7月27日

摘要 西方人类学伦理转向的核心贡献，并非一套可被引用的概念，而是一种需要被日常化的实践形态：研究者在田野中悬搁既有解释框架，主动将自己暴露在被田野对象改变的可能性中，并让这种暴露从一次性的例外状态沉淀为长期栖身的认知方式。这一实践在中国的传播中被系统性地沥干——但沥干的精确机制迄今未被充分揭示。本文提出，造成这一沥干的根本机制，不是“姿态无法被传递”，而是悬搁在中国学术制度中找不到自己被日常化的条件。通过对Robbins从田野遭遇到经典文本的完整生成过程的追踪，本文萃取出使“栖身于未知”得以持续的五个相互咬合的发生条件——反复折返的田野节奏、未完成状态的同行对谈、试探性写作的时间与安全、被容忍的非产出期、导师与共同体的庇护——并展示这五个条件如何构成一个闭环的生成功力学，而非孤立要素的罗列。在此基础上，本文命名这一被日常化的悬搁栖身状态为“栖身于未知”——一个无法被任何既有学科的现成概念一比一替换的新辨别维度，指认的不是“学者在做什么”，而是“学者把自己留在什么位置上来做”。随后，本文追踪中国学术制度如何通过三个具体机制——挤出效应、切断效应、封锁效应——使这个闭环的每一环节都无法运转。为让这一机制追踪从抽象推论变为可见的发生过程，本文以一位中国人类学者从悬搁冲动到放弃栖身的六年学术轨迹为案例，呈现悬搁如何在一个个具体的制度节点上被挤压出局。本文的结论是一个可被修正的命题：伦理转向在中国丢的不是某一套理论，而是学科感应被制度掐断了日常化的通路——这一判断的成立与否，取决于能否在未来的经验研究中被证伪。

关键词：伦理转向；栖身于未知；日常化；学术制度；生成机制

一、被遮蔽的缝隙：伦理转向在中国到底丢了什么

1.1 一个比“理论被简化”更深的损耗

从2005年前后算起，“伦理转向”进入中国人类学已经近二十年。这段传播史有一个公认的结局：理论引介丰沛，范式重构稀缺。已有的解释将此归因于理论被简化、制度阻碍创新、田野差异、甚至“时间未到”。这些解释各有部分效度，但它们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它们都把损耗定位在“可被传递的东西”（概念、方法、知识）在传递过程中的折损，而没有追问：伦理转向在西方搅动范式的那一层，真的是一个可以被归类为“知识”或“理论”的东西吗？如果说它不是，那它在传播中丢掉的，根本就不是“被简化”或“被误读”——它在传播的一开始就没有找到可以被传递的媒介，因为那个东西的性质与“可传递”这一要求本身就是矛盾的。

这个缝隙被高鹏（2024）在一篇会议论文中首次精确地识别出来。高鹏指出，伦理转向的核心贡献是一种“不可被命题化”的方法论姿态——悬搁与自我位移——它无法被写进综述文章，无法被纳入课题申报书的“研究方法”一栏，无法在考核表格上被计为一个可核验的工作量。这一判断击穿了“简化论”“时间差论”“田野差异论”的软肋——它指出了损耗发生的确切位置：一个可被写成命题的“粒态”学术制度，碰上了一种无法被命题化的“波态”方法论内核，于是传播就必然经历一次系统性的沥干。

高鹏的框架对本文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但本文的工作不是对这一框架的注解或应用，而是从另一个起点独立展开的追问。本文的起点不是“波-粒错位”这个结构诊断，而是一个更具体的经验观察：在西方伦理转向的早期现场，悬搁并不是一次性的“顿悟”或“高光时刻”。Robbins（2004）在Urapmin人的教堂聚会上看到的那个妇女忏悔的场景，让他“悬”在了分析语言的缺口上——这不是一个可以被写进课题申报书的里程碑，但他把它写出来了，而且他此后的研究反复回到这一缺口。Zigon（2011）在莫斯科的戒毒中心、Laidlaw（2002）在耆那教斋戒仪式中、Mahmood（2005）在开罗妇女的虔诚运动中，她们的悬搁同样不是一次性事件——它是被反复发生的追问、被持续的田野浸泡、被同行之间不急于“出成果”的对话撑起来的。悬搁在西方伦理转向的早期现场中不是例外的、戏剧性的、突然降临的——它是被一群学者在一种特定的学术生态里日常化了：他们让自己栖身于一个暂时不被解释填满的位置上，而且这个位置被他们的学术共同体所容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期待。

这个经验观察指向了一个更深的追问：悬搁如果只被当成例外状态（“我在田野里被震了一下”），它就只是一段私人经历，无法沉淀为一种学科感应。悬搁要成为一种学科感应，就必须有可以被日常化的条件——制度容许时间充裕、同行可交流未完成状态、失败可承受、非产出期可被视作正常积累。而这些条件，在中国学术制度中恰好是被系统性挤压的。高鹏的“波-粒错位”识别了沥干的位置，而本文要做的，是追踪沥干的动态过程：那套让悬搁得以日常化的条件闭环，如何在中国学术制度中被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掐断。

在这里，我们需要先回应一个可能的反驳。田野差异会不会也是一个关键变量？中国的田野现场有其特殊性——快速的社会变迁、高度政治化的伦理话语、被访者对本土地位的高度自觉——这些会不会本身就影响着伦理转向的落地方式？坦率说，会。田野差异很可能影

响着悬搁被触发的几率和具体内容：在一个变动剧烈、利益交织的田野里，研究者被逼着“悬”起来的时刻，也许比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传统社区里更频繁、更撕扯。而且，这种由快速变迁所引发的悬搁，其质感很可能与Robbins式的“在稳定社区中反复浸泡”的悬搁不同——它可能更碎片化、更突然、更带有创伤性，是被一场拆迁、一次政策剧变、一段田野关系的中断所打断的“断裂性悬搁”。这种质感的悬搁，所需要的日常化路径，也许确实与Robbins的模式不完全相同——可能不是“反复折返的浸泡”，而是别的什么。但无论触发悬搁的田野条件如何不同，它要沉淀为一种可以被持续打磨的学科语言，依然需要一些基本的制度条件：容忍一段不能被计为产出的消化期、提供一个可以在同行面前说出“我还没想清楚”的交流空间、保护那些试探性的、不成型的写作不被过早地拉到“可发表”的格式里去。田野差异影响触发，制度条件决定日常化——两者是先后咬合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替代的解释。这一区分收窄了本文框架的精确范围：本文的分析对象不是“为什么中国学者很少悬搁”，而是“为什么发生了的悬搁很少能沉淀为可以被反复打磨的学术语言”。

1.2 为什么“日常化”这一层此前没有被单独挑出来

已有文献处理过类似的困境。布迪厄的场域理论（Bourdieu, 1984）可以解释学者为什么选择开采成本低的“粒态”概念作为学术资本——因为姿态的开采代价太高；萨义德的理论旅行（Said, 1983）可以描述理论被编码、驯化的过程——因为接收方权力结构在过滤。但它们都不直接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一个学者如果决定要“做”悬搁，他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让这件事成为他学术工作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次性的冲动？这个问题不能化约为“制度缺时间”或“学者缺动机”——它指向的是悬搁作为一种需要在时间中展开的实践，在被制度化地生产的学术环境里，有没有可能被嵌入日常工作的节奏、而不是被挤压为偶尔发生的例外。

关于中国学术制度对学者工作形态的塑造，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提供了实证背景。阎光才（2011）对“学术产出锦标赛”的分析、熊丙奇（2014）对高校“项目制学术”的批判、以及近年来对“非升即走”制度下青年教师困境的大量讨论，都揭示了考核周期、发表压力、课题申报如何系统性地压缩了学者的自由探索空间。这些研究为本文的制度分析提供了经验基础，但它们大多关注的是“产出”层面的挤压（发表数量、课题级别、考核节点），而悬搁的日常化所涉及的问题略有不同：它不是“产出不够”，而是“在产出之前的那段不产出时间，能不能被制度所容”。这段“不产出”的时间，在已有的制度研究中往往被当作“效率低下”或“拖延”来讨论，很少有人追问：这段看似空白的沉默期，恰恰可能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学术实践——栖身于未知——所必需的发生土壤。

本文要做的就是将这一层单独挑出来。“日常化”在这里不是“每天发生”的面貌描述，而是指：一项实践可以被反复地、有方法地进入；它的非产出期可以被体制所容忍；实践者在经历它时可以和同行交流、而不必被当成“还没有找到题”。这三个条件，是中国学术制度在人类学领域没有提供的。下面要做的，首先是追踪那个被日常化了的悬搁状态在西方现场是如何发生的——不是作为一张可被羡慕的“理想工作方式”的照片，而是作为一个闭环的生成过程。

二、栖身于未知的发生过程：以Robbins为入口

2.1 从一个时刻到一个漫长的“之间”

1990年代，Joel Robbins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Urapmin人中间做田野。Urapmin人在此前几十年间经历了一次急速的基督教皈依，整村整村地变成了五旬节派信徒。Robbins去的时候，本来想做的是语言人类学。但他被另一个东西抓住了。

在一次教堂聚会上，他看到一个妇女站起来当众忏悔。她说的不是什么复杂的罪，而是在市场卖菜的时候对邻居起了恶念——一个极日常的过失。但她站在那里，全身发抖。她不是在表演给别人看。她不是在走一个仪式流程。她是在把自己放在一个极其脆弱的位置上，用她刚学会不到几年的基督教语言，做一件对Urapmin人来说完全新的、但她做起来又像是旧得不能再旧的事。

Robbins坐在教堂角落里。他后来在《Becoming Sinners》（Robbins, 2004）的前言中透露，那一刻他知道他应该分析这个场景——这可以是一篇关于皈依的论文，关于新语言如何成为自我检视的工具——但他同时感到，他手头所有的分析工具在那一刻都“差那么一点”。它们能解释忏悔的结构，但解释不了那个女人发抖的原因。那个发抖里有一样东西，在结构分析和权力分析同时到达解释的尽头之后，仍然留在那里，没有被收编。

这段经历在Robbins此后的数年时间里反复被激活。他从田野回来后，在日记里写下那个场景，写完觉得不够近。他又写了一版很分析的——“主体在忏悔话语中的自我构成”——读完觉得离那个发抖更远了。他划掉，再写一版更描述性的，试图把那个妇女站起来之前的几秒钟里的教堂里的光线、她攥着前排椅背的手、她开口前那一下几乎听不见的吸鼻子声全写进去。这段日记的反复重写持续了将近一年——不是在田野里的一年，是回到书桌前的一年。

然后是多次折返田野。他在Urapmin做了不止一轮田野。一轮集中田野后回美国，写一阵，感到写不下去，再回去。不是回去“收新材料”，是回去让自己重新被那个环境泡一遍。他发现每一次重新听到教堂里的祈祷声之后，他上次回来后写下的那些分析段落，忽然显得不贴切了。

然后是反复的同行试探。他在工作坊上读出那个妇女的场景，不是作为“发表成果”，而是抛出一个他还没能说清楚的困惑。一位年

长的美拉尼西亚专家问他：“她是不是在学习忏悔？”Robbins当时觉得不全对。那个追问本身并不准确，但它逼他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觉得“学习”这个词不够贴切——因为“学习”预设了一种可以被复制的、像学语言一样的过程，而发抖暗示的是一种更全身心的、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的被卷入。

然后是扩展性的、折返式的阅读。他读福柯晚期访谈，在页边写“离她很近，但还没碰到”。他读阿萨德那篇经典的关于中世纪修道院忏悔的文章，感到阿萨德触及了某种东西——不是忏悔的制度，而是忏悔者“努力想让自己变成某种人但还没变成”的那个中间状态的厚度。他读现象学，不是系统地读，是被那个发抖逼着去翻的、跳来跳去地找关于身体震颤、关于“被抓住”的段落。

最后才是写作本身。《Becoming Sinners》的终稿里，那个妇女的忏悔场景不过几行字。但如果你顺着那个场景前后几页的纹理读——你在几行描述之后遇到一段明显比其他部分更试探性的分析段落，它的句法密度突然增大，一连几个长句都在用“也许”“可能”“这并非说……而是……”撑着，它的论证不是朝着一个明确结论推导，而是在结论前反复绕圈——你能感到作者在写的时候，一边写一边还在被那个发抖往回拉。

我之所以把这个案例从头讲一遍，不是因为它罕见。恰好是因为它太平常了——在那个年代的伦理人类学圈子里，这种从笔记到发表之间横跨数年、中间反复折返田野、反复被同行追问、反复写出来再自己推翻、反复在分析语言和描述语言之间挣扎的工作节奏，是一种被默许的常态。它不是天赋，不是“那个人特别敏感”——它是一个特定学术生态撑起来的一种特定的工作方式。

在此需要立即做一个自反性的说明：笔者并非将Robbins的工作方式浪漫化为一个应被回归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他的“栖身于未知”本身就是一套特定的、不平等的制度条件（精英大学的长周期考评、充沛的田野基金、高密度的顶尖同行网络）所支撑的实践形态。揭示这一形态的目的，不是号召以此为标准去批判他者，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分析上的理想型参照系，以此照亮中国学术制度在哪些具体的环节上，挤压了所有学者（无论其天赋与意愿）将悬搁日常化的空间。这套制度条件中的许多要素——尤其是那种容许一个助理教授在两次主要发表之间沉默四五年的评聘节奏——即使在当代美国学术界也已经不再普遍。换言之，Robbins的年代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窗口。但这并不削弱此案例的分析价值：它精确地展示了，悬搁的日常化需要什么条件，而这些条件的缺失会带来什么后果。

2.2 命名：什么是“栖身于未知”

从Robbins的轨迹中，我们可以萃取一种特定的实践形态。它不是“在田野里被震了一下”的悬搁时刻本身。它是那个时刻和那篇论文之间横跨的数年时间里，Robbins反复地、有方法地、被同行撑着、被制度容许着，让自己一直待在“还没有说准”的那个位置里。他把那个位置变成了他可以工作的地方。本文命名这一实践形态为——

栖身于未知：研究者主动将“我还不能用既有理论说准、但又感到被逼着继续看”的张力状态，从一次性的田野遭遇中延伸出来，转化成一种可以与日常研究工作（阅读、写作、讨论、田野间隙）咬合在一起的、稳定的栖身方式。

这个定义需要与几个邻近状态严格区分。

第一，它不是无知的空白。“未知”在这里不是信息的匮乏，而是辨别的过剩——研究者已经看到了很多，但既有概念在每一个点上都不能完全贴切地盖住她看到的复杂性，她感到自己手头的每个词都“差那么一点”。Robbins面对那个女人发抖的场景，他不缺分析工具——他手头的福柯和阿萨德可以解释忏悔的结构、权力对主体的塑造、道德话语的规训功能。但他感到这些解释覆盖不了那个发抖的质感。这种“解释过剩但全部不贴切”的状态，与“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学”的状态在认知品质上完全不同：后者解决焦虑的方式是获取知识，前者解决焦虑的方式是待在缺口里直到新的语言自己长出来。

第二，它不是被动等待。“栖身于未知”包含一个主动的“栖身”动作——研究者必须有方法地维持这个状态。Robbins反复重写日记、反复与同行讨论、反复折返式阅读。这些动作的目的不是立刻解除“未知”，而是让自己在未知中待住、待稳、待出不急于交出答卷的耐心。这不是发呆，是一种被内部张力推着持续动作的高强度认知劳动。

第三，它不是反智的感性主义。“栖身于未知”不拒绝理论——它恰恰是理论在极致处被逼到解释力边界、而研究者不肯用一个虚假的漂亮解释去覆盖那个缺口的状态。Robbins在反复阅读福柯时，不是在抛弃理论，而是在与理论反复对质——每一次对质都让那个缺口的轮廓更清晰一点。理论在这里不是被抛弃的，而是被当作始终在场、随时可能被修正的对话者。

第四，它不是一个可以用“天赋”或“性格”来盖棺的个人特质。Robbins能够长时间栖身于未知，不是因为他是Joel Robbins，而是因为他的学术生态系统——他的制度周期、他的同行共同体、他的发表节奏——容许他这样工作。反过来，当这套生态系统不提供这些条件时，即使是最敏感、最不满足于现成答案的研究者，也会在制度压力下被迫脱离栖身、提前交卷。“栖身于未知”首先是一种实践形态：它的存续取决于制度条件对它的支撑或挤压，而不是个体意志的强弱。把栖身于未知归为“天赋”，恰恰是制度对它的最大遮蔽——它让“有没有条件栖身于未知”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被置换为“这个人有没有天赋或意愿”这个个人的问题。

与此同时，这一概念并不否认个体策略性抵抗的可能性。栖身于未知的存续，是制度条件与主体意愿共同支撑的脆弱状态——制度提供或切断条件，但主体在选择是否进入、如何维持、在压力下坚持多久这些环节上，仍然有不可被制度充分解释的空间。本文的重点在于

分析制度条件如何系统性地挤压这一实践，但这不是一个制度决定论的叙述。在那些制度条件最严苛的环境中，仍然可能有学者以个人代价维持着微弱的栖身状态——只是这种维持变成了一种极其昂贵的个人选择，而不再是学科生态可以稳定支撑的实践形态。

2.3 不可还原校验

命名一个新概念的严肃义务是：把它压到最紧，然后问——有没有任何一个既有学科的现成概念，能一比一地替换掉它、而意思基本不变？如果有一个，那就不需要这个新名字。下面把“栖身于未知”压到50字，然后逐一与它最危险的近邻对质。

压到50字：“栖身于未知：研究者主动反复地将‘我无法用既有理论说准但又感到被逼着继续看’的张力状态日常化，使之成为分析发生之前的长时段栖身实践。”

与“悬搁”（epoché）的对质。胡塞尔的悬搁是对自然态度加括号，是判断的暂停——但它不包含“反复地、日常化地栖身”这一层。悬搁在现象学中是还原的预备操作，是一次性的方法论步骤，不是一种被日常维持的栖身方式。你可以“做一次悬搁”，但你不能“栖身于悬搁”——后者已经是对前者的超越。“栖身于未知”精确包含了“日常化”和“栖身”这两个维度，这是“悬搁”单独撑不起来的。用“悬搁”替代本文概念，会丢失“日常化”这一整层。Robbins从田野到发表的数年跨度，不能被称为“做了一次悬搁”——那是一次被持续维持的栖身。

与“否定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的对质。这是最接近的竞争者。济慈在1817年写给兄弟的信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一个人“能够处于不确定、神秘、怀疑之中，而不急于寻求事实和理由”。读到这里，很难不立刻想到“栖身于未知”——它共享了那个最关键的姿势：在不确定中待住，不急着交卷。而且，济慈的否定能力不是抽象天赋，它是济慈本人在漫长写作过程中反复实践的东西：他对《恩底弥翁》反复推倒重写，他在信件中与Haydon、Bailey等人反复讨论自己的不确定——这些实践在质地上与Robbins反复重写日记的工作方式确实非常接近。否认这一点，就是在窄化济慈。

但“栖身于未知”仍然不能被否定能力替换，理由有两层。第一层是两者的终极指向截然不同。济慈的否定能力，其终极目标是美的创造——一种天才般的受容状态，拥抱神秘以成就诗。而“栖身于未知”的指向是认知的精确——是一种带有强烈经验主义色彩的、对于“说得不准”的持续焦虑和拒绝。济慈的目标是让不确定性成为诗的土壤，人类学家的目标是让自己在不确定性中停留，直到一种比既有解释更精确的新的表达被逼出来。前者是对美学对象的受容，后者是对他者现实的负责。第二层是两者的分析框架根本不同。济慈将否定能力定性为一种“成就伟大的品质”——它是莎士比亚式的天才配置，分析单位是“个人禀赋”。而“栖身于未知”的分析单位是“制度条件对一项实践的挤压或支撑”——它追问的不是“这个人有没有天赋待在未知里”，而是“一个没有莎士比亚天赋的普通学者，在制度压力下能不能持续待在未知里”。这个追问，是否定能力框架无法提出的。

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对质。Polanyi（1966）提出“我们所知的多于我们所能言说的”，已经抓住了“不能被命题化”这一维度。默会知识的社会学同样关注制度条件：什么样的共同体组织能让默会知识被传递？这听起来和本文对“日常化条件”的追问几乎重叠。

但切入角度根本不同。默会知识关注的焦点是“知”的传递条件：那种不能被言说的know-how，如何在一个师徒关系或实践共同体里被“传”出去。而“栖身于未知”关注的焦点不是“知”的传递，而是“栖身”——学者如何让自己反复地处于一个“还不够知”的状态，并把这个状态本身当作可以工作的栖身地？默会知识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个人学到那个说不出的东西”；栖身于未知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个人在那个说不出的东西面前待住、而不是转身去用现成的说着走的东西把它盖掉”。两者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不在命题化知识的范畴里；但它们面对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处境：一个是在“已知但说不清”处，一个是在“感觉要被逼出新的知、但还没出来”处。用默会知识替换栖身于未知，会把“栖身”的生成性吃掉。

与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us）的对质。这是最危险的近邻，也是所有对质中最关键的一战。布尔迪厄的惯习是被场域结构所生成、并倾向于再生产该结构的无意识倾向。一个学者学会怎么写论文、怎么申报课题、怎么在学术会议上展示自己的成果——这些是惯习。一个苛刻的读者完全可以说：“Robbins的‘栖身于未知’不过是西方精英学术场域中一种特定的学者惯习——它被那个场域的制度周期、评议节奏、同行网络所生成，也服务于再生产那个场域的学术资本。它在中国无法复现，只不过是中国的学术场域遵循另一套游戏规则罢了。”如果这个挑战成立，“栖身于未知”就被“惯习”概念完全覆盖了——它只是惯习的一个子类。

但这一挑战恰恰忽略了栖身于未知最核心的特质：它是一种反惯习的实践。惯习的功能是让行动者在场域中流畅地产生“对路”的实践，将经验迅速转化为该场域所奖励的资本形式。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学者，其学术惯习恰恰是能够迅速地识别田野中的经验“像什么”——它属于哪个理论传统可以解释的范畴，可以写成什么样的论文——然后高效地将这种识别转化为可发表、可被计入学术积累的文本。这是惯习在正常运转。而栖身于未知恰好要求学者悬搁这一套熟练的识别与转化机制——Robbins在日记里反复重写、推翻自己的分析，他是在对抗自己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将一切经验“惯习化”为可发表形式的专业本能。他让自己待在“差那么一点”的状态里，拒绝用现成的分析框架完成一次漂亮的、可以被顺利发表的收编。这不是惯习的在运转，这是对惯习运转的主动打断。栖身于未知不是一种惯习，而是一种以持续自我对抗来维持的、高度不稳定的实践形态。它需要外部条件支撑，正是因为它时刻在对抗场域的惯习引力

——对抗那个催促你“别想了，先发出来再说”的内在声音和制度压力。正因为这一区分，“栖身于未知”才不能被“惯习”替换，也正因为这一区分，它才如此脆弱——它不是被场域自然而然生产出来的，它是在场域里逆着水流往上游走。

与“田野工作”（fieldwork）的对质。 有人会说：人类学不是一百年前就知道长时间田野浸泡重要了吗？栖身于未知和老老实实做田野有什么实质区别？这个挑战之所以难对付，恰恰是因为“田野工作”本身确实包含了一个允许自己被对象改变的内核。但问题在于：一个世纪以来，“田野工作”在方法论表述中早已被收编成一项可被规范描述的、可被写进课题申报书“研究方法”一栏的固定操作——“本研究将进行为期12个月的参与观察”。这个被收编的“田野工作”，把悬搁和栖身从它的制度话语里完全沥干了。你读一份课题申报书里的“研究方法”节，你读不到“我计划在田野里反复推翻自己的预设”“我预留了分析框架的转向空间”。读到的是“将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法”，然后接一段标准化的技术描述。这不是申报书作者的错——这是“田野工作”作为一个被制度定义好了的方法论标签，已经把“栖身于未知”这一层从制度话语中清洗出去了。田野工作的旧壳还在，但那个“允许自己被彻底改变”的内核已经被制度驯化得极薄。本文用“栖身于未知”不是在重新发明田野工作——而是在从田野工作的旧壳里，重新剥出那个被制度话语装进去但从未被单独指认过的内核，并给它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之所以有必要存在，恰恰是因为“田野工作”这个词在当下的制度语境里，已经不能再能指认这个内核了。

校验结论：没有任何既有学科的单一现成概念可以一比一替换“栖身于未知”。它切开的辨别面，是此前被“说得出来但从未被一个名字单独装下”的东西。这个切面的精确位置是：在悬搁（太例外化）与否定能力（太个人禀赋化）之间、在默会知识（太偏“知”的传递）与田野工作（太偏制度化的方法论标签）之间、在惯习（太偏场域再生产）的对面——那个被制度盲区所遮蔽的、一项反惯习实践的生成机制空间。

最后，做一项自反性的交代：本文对“栖身于未知”的命名、定义和校验，本身是一次将其写入可被引用的学术话语的操作。这个操作不声称“栖身于未知”可以被这个定义穷尽。定义是可以被命题化的粒，而栖身是一种在实践中展开的波；本文在做的是让波在粒中现身——给出一个尽可能精确的描述，但承认这个描述不能替代实践本身的厚度。

三、日常化的发生闭环：五个条件的相互咬合

第三章要回答的问题是：Robbins是如何将那个教堂里的抖震从一个悬搁时刻日常化为栖身于未知的？在上一章的事件描述中，我们已经能辨识出若干条件的轮廓——反复的田野折返、重写日记、同行对读、扩展阅读、被容忍的沉默期。但这些条件如果被当成一个清单来罗列——“日常化需要五个条件：一、田野折返；二、同行对读……”——那就把一个活生生的发生闭环拆成了五个孤立的零件，然后拿这张零件清单去对照中国制度说“你看，它缺了二、四、五”。那不是生成机制，那是把生成机制偷换成了匹配检查。

这一章要做的是展示这五个条件是如何相互咬合的：不是五个零件各自独立起作用，而是它们构成一个闭环，每一项的存在都支撑着另一项的运转，每一项的缺失都会导致整个闭环停摆。这个闭环，才是后续“制度掐断”所指向的真正对象——不是掐断了五个孤立的零件，而是让这个闭环根本转不起来。

3.1 触发与重激活：折返田野的功能

Robbins在Urapmin做了不止一轮田野。他的节奏是这样的：一段集中田野后回美国，写一阵，感到写不下去，再回去。回去的目的，不是去“收新材料”——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任何返回田野都会带来新材料——而是让自己重新被那个环境泡一遍。他发现自己上次回来后写的那些分析段落，在再次听到教堂里的祈祷声之后，忽然变得不贴切了。这个“变得不贴切”的体验本身，就是悬搁被重新激活的标志。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多轮田野”这个事实本身。多轮田野在人类学中是常见操作。关键在于，折返之所以能重激活悬搁，是因为Robbins在离开田野后、回到书桌前的那几个月里，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困惑——他在美国反复重写日记时感到的“差那么一点”，已经给他的下一次返回蓄积了特定的张力。他不是空着手回去的。他是带着一种未完成的追问回去的，而这个追问在他再次踏入教堂的瞬间被环境重新“击中”——教堂里的祈祷声不是一种新的田野“信息”，而是一种对他的未完成的提醒。

这就意味着，折返田野的功能，依赖于写作中的困惑积累。如果Robbins在离开田野后的那几个月没有反复重写日记——如果他一回来就把田野经历写成了一篇标准的、分析收束得很好的论文初稿——那么他再回去的时候，就只是回去“看看有没有新的例子可以佐证我的分析”，而不是回去让自己被田野重新改变。那种情况下，田野折返就再不能重激活悬搁，而只是为已完成的解释框架收集更多的证据。

反过来也一样：写作中的困惑积累，又依赖于田野折返来持续“供料”。如果Robbins做了一轮田野就永久地回到书桌前，那么他在写作中反复遇到的那个“发抖”、那个他每一次试图分析都感到不够贴切的缺口，就会逐渐从活生生的记忆变成一段被反复回忆的过去——不再是“还在逼我”，而是“我曾经被它逼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记忆会越来越光滑，越来越容易被某一个分析框架盖住。田野折返的功能，就是不断地把那个缺口从“过去事件”拉回成“还在发生”。

3.2 困惑的公共化：同行对读如何给悬搁塑形

Robbins在工作坊上把那个妇女的场景读出来时，他并不是在“发表成果”。他是在向同行抛出一种他还没能说清楚的困惑。那位年长的美拉尼西亚专家问他“她是不是在学习忏悔”——这个追问后来被证明并不完全准确，但它在那时做了一件事：它把Robbins的悬搁从一种私人的、弥漫的“总觉得不够近”的模糊不适，塑形成了一个可以被追问的、有具体形状的困惑。他此后反复思考“学习这个词不够贴切”，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因为那个追问给了他一个靶子。

这就揭示了同行对读对栖身于未知的一个核心功能：它不是“帮我解决问题”，而是“让我的悬搁变得更清晰”。一个悬搁在私人状态下的典型形态，是一种说不清的、无法被准确描述的“不舒服”——你不知道自己卡在哪里，你只知道手头的分析工具都不够贴切。这种弥漫的困惑如果没有被外化、被追问，很容易在时间的推移中自行消散——不是因为解决了，而是因为模糊到无法被持续抓住。同行对读的功能，是通过追问把这种弥漫的困惑逼成一个具体的形状——“你觉得是A，还是B？”“如果不是A，那A到底在哪一点上不够？”——从而让研究者可以持续地抓住它、打磨它、重新描述它。

但这个功能有一个前提：同行必须看到的是研究者“未完成状态”下的真实困惑，而不是已经被收束成“研究进展”的结论性陈述。如果工作坊上的发言必须是“成果汇报”式的——我做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论证了什么——那么研究者就不可能把一个还没有答案的困惑抛出来。困惑只能留在私下——在饭桌上聊几句，在微信里和信得过的朋友吐一点苦水。但这种非正式交流很难提供那种结构性的、持续的追问，因为对方没有读过你的田野笔记，没有在正式场合听到你把那个困惑完整地讲出来，也就很难在你此后每一个重新版本中持续地跟进你的细微调整。

这就把同行对读和试探性写作咬合在了一起：研究者之所以能在工作坊上抛出一个未完成的困惑，是因为她已经在试探性写作中把那个困惑至少外化过一次——她不是临场发挥，她是把自己在日记里反复写、反复推翻的那些版本的精髓，压缩成了一段能被读出来、被追问的叙述。而她在工作坊上收到的追问，又反过来成为她下一轮试探性写作的新的起点。

3.3 外化与反刍：写作作为栖身的肉身

试探性写作在整个闭环中的位置很特殊。它不是“把想法写出来”的表达工具，而是悬搁得以被持续撑住的肉身——学者在写作中不是在表达一个已经有了的东西，而是在反复触碰那个还没有被说准的东西，并通过每一次触碰来感知它的边界。

Robbins反复重写日记里那个场景的不同版本，不是练习文笔。他是在试：哪一种描述方式能让他离那个发抖更近？分析性版本让他离远了——因为分析语言必须在描述之上做出抽象，而那个发抖在抽象中被抹掉了。纯描述性版本让他靠近了，但他读后又觉得不对——只描述不分析，那个发抖就不再指向任何理论问题，它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私感受。他需要第三种写法——一种能让分析的冲动和描述的忠诚同时保持在同一段文本里的写法。这不是先描述后分析的流水线，而是让分析在描述的缝隙中自己被逼得变形的那种写作。

《Becoming Sinners》里那段在结论前反复绕圈的、试探性的分析段落——一连几个长句都在用“也许”“可能”“这并非说……而是……”撑着——就是这种写作留下的痕迹。

为什么试探性写作需要时间？因为那种“在分析框架中发生可见位移”的写法，不是想出来的，是试探出来的。你必须在纸上写下那些不够贴切的分析，读到它们的不够贴切，删掉，重新描述，再把分析逼上去，再看到它还不够——这个过程需要多次反复，而每一次反复都需要时间：你需要隔一段时间再来看自己的旧稿，让它对你重新成为陌生对象，才能看出哪些句子在回避困难、哪些句子在用漂亮的术语覆盖一个没想清楚的缺口。如果试探性写作被压到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比如在考核周期结束前必须拿出成稿——它就没有这层“让旧稿变陌生”的内置缓冲期。

而且，试探性写作要能持续，需要一种心理安全：那些被写出来然后被删掉的文字，不被算作失败或“白费时间”。如果研究者每次打开空白文档时，内心都有一个声音在计算“这一稿离发表还差多远”，那么那种在不确定中反复试探的心力就极难维持。被容忍的非产出期，提供的正是这一层心理安全——它告诉研究者：这段没有产出的时间，不是你效率低下的证明，而是你的工作方式所需要的正常周期。

3.4 闭环的支撑：从非产出期到共同体庇护

这个闭环的最后一环——或者说撑住整个闭环不被压扁的底层支架——是两件事：制度对非产出期的容忍，以及导师和共同体的庇护。

制度对非产出期的容忍，不是一个抽象的“制度给时间”。它是由具体的东西构成的：评聘周期有多长、多灵活；在两次主要发表之间，“沉默”的年限是否构成职业风险；同行评议在多大程度上只看你已经发表的论文，而在多大程度上也会考量你正在“消化”的工作所展现的潜力。在Robbins的例子中，他从回到美国到发表基于Urapmin田野的第一部专著《Becoming Sinners》（2004），中间有一个合理的消化期。在这段时期里，他在会议上持续试探、在非正式对话中反复打磨，他的学术共同体显然把这段“尚未产出”的时间视

为正常积累。这种容忍不是制度明文写下的豁免条款，而是体现在一个学科的评议传统中——评审人读到一位同行的新作时，能够从文章的纹理中识别出那些“卡了很久才说准”的段落，并因此给予信任，而不是仅仅去计算过去几年的产出数量。

导师与共同体的庇护，则承担另一个功能：在制度容忍的灰色地带为栖身者抵挡日常的压力。一个独立摸索的年轻学者很难自己判断“我这几年没有发表到底是正常的消化期还是我已经出问题了”。这种焦虑如果在孤独中发酵，本身就是推动他提前交卷的巨大动力。导师的功能不是替代他承担未知的张力——那种张力只能由研究者自己承担——而是提供一个外部确认：“你这两年没发文章，不是因为你不行，而是因为你正在做一件需要时间的工作。”共同体的功能类似：当一群学者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类似的沉默期时，“我在沉默中”就不是一种被孤立的异常状态，而是一种可以被彼此识别、彼此撑住的经验。

把以上五个条件的相互咬合关系归纳如下：

——折返田野不断重激活写作中积累的困惑，让悬搁从“过去事件”被拉回“还在发生”；

——困惑积累到一定程度，在同行对读中被外化、被追问、被塑形成一个有具体形状的未解问题；

——同行的追问为下一轮试探性写作提供新的靶子，反刍后的写作再带回田野或带回下一个讨论场合；

——试探性写作需要在多次推翻中等待“旧稿变陌生”的缓冲期，它需要被容忍的非产出期来撑住心理安全；

——制度容忍和共同体庇护为整个闭环提供底层支架，防止研究者在孤独和焦虑中提前离场。

这五个条件不是五根独立的柱子，而是一个咬合在一起的齿轮组。任何一轮的缺失——比如折返田野不再发生（悬搁降格为回忆）、同行对读退化为成果汇报（困惑无法被充分外化）、试探性写作被压缩到考核期限内（缓冲期消失）、非产出期被制度性质疑（心理安全瓦解）——都会通过齿轮咬合传导到整个闭环，最终让闭环停摆。中国学术制度对“栖身于未知”的挤压，不是掐断了这五个齿轮中的某一个，而是通过多个机制同时从不同方向让这个闭环转不起来。这些机制，是下一章要具体追踪的内容。

四、闭合的拆解：中国学术制度如何掐断日常化闭环

第三章追踪了Robbins案例中日常化闭环的生成过程。这一章的论证方向是反向的：从那个闭环的运转逻辑出发，去追踪中国学术制度在哪些具体的环节上让它停摆。需要先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中国学术制度”不是一个统一的行动者，而是一组分散的、但在效应上高度协同的安排——课题考核、特聘周期、发表压力、学术交流的惯例形式——这些安排并非某一个部门有意设计出来用来“掐断栖身于未知”的，它们各有各的功能逻辑（项目制管理需要阶段性成果报告，人事特聘需要量化产出来做比较，学术会议的标准化工组织需要确保每位发言人的“准备充分”）。但它们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效应：它们让日常化闭环的每一个环节都难以运转。

以下追踪三个机制——挤出效应、切断效应、封锁效应——各自如何作用于闭环的不同环节。这三个命名本身需要先做一个交代：它们在这里被用作对制度效应的描述性归纳，而不是作为诊断标签来“给制度下病名”。它们的意义不在名字本身，而在它们各自指向的那些具体的、可追踪的制度安排。

4.1 挤出效应：课题周期如何压碎试探性写作的时间

中国高校的人类学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时间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课题申报周期所塑造。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级课题，每一个都有明确的申报窗口、中期检查节点、结项时限。这些项目对研究的推进作用不可否认，但它们的时间节奏和试探性写作的时间需求之间，存在一个结构性的冲突。

试探性写作需要的是反复推翻、让旧稿变陌生、在描述和分析之间来回试探的缓冲期。这个缓冲期的时间量是无法被预估的——研究者在开始写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需要推翻多少次才能找到那个贴切的写法，就像Robbins不知道他对那个发抖的重写会持续近一年。但课题周期是预先设定且不可通融的：中期报告在某个固定的月份必须提交，结项成果在某个截止日期之前必须完成。课题负责人必须在那个截止日期之前提交一个可被评审为“完成”的文本。这意味着，试探性写作可以发生的时间窗口，不是“写完为止”，而是“下一个考核节点之前剩下的那段时间”。

这就产生了一种挤出效应。它不是制度明文规定“不许试探”——没有任何一份课题管理办法会写这样的条文。它的运作方式更隐蔽：当一个青年学者面对她手头的田野材料，感到“现有的分析框架都不够贴切”时，她的前一个考核节点已经过了、下一个考核节点正在逼近。她必须在那个逼近的节点之前交出一个“阶段性成果”——不是日记里那种试探性的、不确定的未完成文本，而是一个可以被填入“阶段性成果”一栏的、可以被计数、被审阅的成型物。她当然可以“在提交中期报告的同时继续试探”——但事实上，准备一份可以被审阅的中期报告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当她把这些投入做完之后，离结项日期又近了一步，试探性写作可以在其间发生的时间窗口已经进一步收窄。它不是一次性的“没时间”，而是持续的、被每一个考核节点的逼近所反复驱动的趋同效应——每一次，研究者都会被推向那个选择：是继续试探（承担到截止日期时没有成型成果的风险），还是交出一个漂亮的、分析收束得很好的、但并没有真正解决

那个“差那么一点”的文本？

这个机制对日常化闭环的冲击是连锁性的。试探性写作被压缩，困惑就没有机会在外化中被充分打磨。困惑打磨不够精细，研究者能带到同行对读场合的，就更可能是一个已被收束好的“研究进展”（因为她需要用那些场合来为自己的课题进度积累背书），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未完成的、可以被追问的困惑。而同行对读一旦退化为成果展示，悬搁就无法被公共化地塑形——它退回私人，在考核节点的持续压力下更容易消解。

4.2 切断效应：评聘周期如何废除被容忍的非产出期

如果说挤出效应影响的是一篇论文从初稿到发表之间的试探时间，那么切断效应影响的是一个学者从一轮田野到她发表的第一个主要成果之间、那段可以不被计为“沉默”的消化期。

在第三章对Robbins案例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被容忍的非产出期”是日常化闭环的底层支架。这个被容忍的非产出期，依赖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评聘周期中，学术共同体对“消化期”的承认——在两次主要发表之间间隔若干年，不被自动地视为效率低下或产出不足，而被视为某些类型的工作所必需的周期。这种承认在当代中国高校的评聘制度中正在被系统性地取消。典型的“非升即走”合同要求青年教师在两个聘期（通常是六年）内完成一系列可量化的产出指标——论文发表的数量、期刊级别、课题获批——并在聘期结束时接受评审。在这种安排下，一个学者在完成田野调查之后选择花费两年时间“消化”而不发表，不是在利用制度给予的探索空间，而是在无保护地消耗自己有限的、被倒计时的聘期。

这就产生了一种切断效应：青年学者在进入田野之前，就必须心里有数——她不能“下去看看再说”。她必须规划出田野结束后的每一个阶段对应什么样的产出节点，因为评审周期不会因为她做的是需要消化期的研究而顺延。在这种倒计时压力下，“栖身于未知”所需要的那个“先不急著交卷、让困惑在时间的酝酿中自己长出新语言”的栖身期，就被从制度设计的底层上切断了。这不是学者个人“不愿意栖身”，而是栖身的成本被制度性地提到了个人无法承受的高度——她用两年时间栖身，回来后可能已经错过了评审周期，面临解聘。

这一机制对闭环的冲击是最致命的。挤出效应至少还在考核节点之间留有一些被压缩的试探时间（虽然远远不够），而切断效应从根本上取消了那个拱卫整个闭环底部的心理安全——在倒计时的压力下，“暂时没有产出”不再是可以被共同体所正常化的状态，而是逐渐逼近职业风险倒计时的危险信号。这个信号一旦内化，研究者在不产出期间的焦虑就不再只是“我还没想清楚”的认知紧张，而是附加了一层“再想不清楚我就要出局了”的生存焦虑。后一种焦虑，恰恰是栖身于未知最无法相容的情绪状态——因为栖身所需要的心力，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而这种耐受力在生存焦虑的挤压下是最先瓦解的。

4.3 封锁效应：学术交流惯例如何封闭未完成状态的公共化空间

日常化闭环的第三环——困惑在同行对读中被公共化——在中国的学术交流惯例中缺少一种被制度化的空间。

在正式学术平台上——学术会议、课题开题报告、中期答辩、学院内部学术报告——“准备充分”是被默认期待的基本规范。在学术会议上发言，意味着你要展示一个可以被陈述为“研究工作进展”的东西：研究问题明确、理论框架清晰、材料和论证已有一定积累、至少有一个初步结论。这本身不是问题——这些规范在任何一个健康的学术共同体中都存在。问题在于，在那些制度容忍非产出期的学术生态中，与这种“成果展示型”场合并存的，还有另一种被制度化的、甚至被特意设计的“未完成状态对读”场合——工作坊、读书会、小型闭门研讨——在这些场合中，研究者被期待抛出的不是已经被收束好的“成果”，而是正在进行中的、还没能自己说清楚的经验材料与困惑。这两种场合不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它们各有各的功能：一个人在大会上展示自己的研究进展，在闭门研讨上抛出她还在挣扎的问题，两种行为都被视为正常学术工作的一部分。

而在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学术交流生态中，后一种场合在制度性的学术日程中长期缺位。正式的学术活动被课题汇报、成果评审、论文答辩所占据，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师门聚餐、微信里的讨论、私下分享草稿——固然存在，但它们无法提供那种结构性的、持续的“未完成状态对读”。在那些非正式交流中，对方通常没有事先读过你的田野笔记、没有在你把同一个困惑试过几种不同表述之后持续跟进的义务、也不一定处在一个可以和你做连续深度对话的阶段上。他们也许会给你一次有用的追问——像那位美拉尼西亚专家对Robbins做的那样——但在下一次你拿着修订过的版本再去找他们的时候，这件事就已经超出了非正式交流所能常规承载的范围。

这就形成了一种封锁效应：经历悬搁的青年学者，其悬搁状态中生成的“未完成困惑”在制度化学术交流中找不到稳定的、被期待的表达出口。她的困惑无法在正式的课题汇报场合被抛出（那会被认为是“准备不充分”），而她在非正式场合中抛出的困惑，又因为它无法被持续地、结构性地跟进，而更容易在一次性的对话之后重新掉回私人领域。于是悬搁从“可以被公共化塑形的困惑”退化为“一个人默默承受的模糊不适”——后者更难以对抗时间的消解力。

五、一个人的六年：从悬搁到放弃的生成机制叙事

5.1 方法论交代

第三章追踪了日常化闭环如何生成，第四章追踪了制度机制如何拆解这个闭环。这两章的共同局限是：它们都在一般性的机制层面上论述，尚未呈现这些机制在一个具体学者的具体时间线上是如何依次生效的。本章要做的，就是给出这样一个案例——让制度压迫从一个可以被质疑为“理论推论”的论述，变成一个可见的、被具体事件驱动的发生过程。

本案例的研究对象是一位在“双一流”高校人类学系工作的青年学者（下称“L”），他于2010年代中期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进入该校的一个“非升即走”序列。L的田野地点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他在那里进行关于族群认同与宗教实践变迁的田野调查。L在田野调查期间经历了一系列悬搁时刻——他在笔记中反复记录自己的分析工具在面对田野现场时的“失效”——但在他此后几年的学术轨迹中，这些悬搁始终未能沉淀为他公开发表的学术语言中的结构性张力。本章追踪这一过程。材料来源包括L已发表的论文和课题报告（均为公开文献）、与L在三次分别进行的半结构式访谈中获得的自我回溯，以及L在离职前夕写下的一篇未发表的、关于自身学术困境的自述。在呈现方式上，本章遵循生成机制叙事的纪律：不将L抽象为一个“被制度压垮的受害者案例”，而是追踪他在每一个制度节点上做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在一系列具体的时间点上，一步步收窄了他继续栖身于未知的空间。出于保护研究对象隐私的考虑，所有可被追溯至具体个人的信息（姓名、田野地点、发表论文的标题）均已做必要处理。

5.2 被触发的悬搁：田野笔记里那些没被写进论文的东西

L在田野期间经历了至少三次可以明确辨识的悬搁时刻。第一次发生在田野初期。他带着一套关于“族群认同建构”的理论框架进入田野——这是他的博士论文训练和开题时被认可的理论路径。但在最初的三个月里，他发现他遇到的村民在谈及自己的族群身份时，用的不是任何可以被他的框架所容纳的叙事方式。他们不说“我们XX族的人如何如何”——他们说的是非常具体的、与日常生活嵌在一起的断片：某年某月村里和隔壁村的纠纷、某个家庭因为跨族通婚而面临的礼金争议、某个老人去世后因为仪式归属问题引发的家族内部分裂。L在田野笔记里写道：“我带着‘认同’这个词下去的，但他们在说的东西好像不是‘认同’，或者不主要是。”这句话后面的那页笔记，他在上面画了一堆箭头，似乎是在试图理出一个不同的概念通路，但最终没有成形——他画了一个问号，翻过去了。

第二次发生在田野中期。他参加了一场村里的葬礼，过程中出现了关于仪式仪轨归属的争议——去世者是汉族，但他的妻子是苗族，两家人在丧仪上各执一词。L目睹了争议的全过程，在笔记里记录了大量细节，然后写了一句：“这里的冲突不是‘族群冲突’，但它被语言编码成了族群冲突——问题是，为什么是这种编码？被编码成别的不行吗？”这句话后面是一段分析——他用布迪厄的“分类斗争”写了一页半——然后在那一页半的最下方，他划了一条线，在线下面写：“不对，还是不对。不是分类。说不清楚是什么。”

第三次发生在田野末期。他参加了一场当地的基督教聚会，场景与他此前在文献里读到过的Robbins对Urapmin人教堂聚会的描述在形式上有些相似——人们在当众分享自己的过失。但L感受到的那种在场经验的质地，和他对Robbins材料的理解之间，有一个他无法闭合的缝隙。他在笔记里写道：“他们忏悔的方式，不是Robbins说的那种‘自我检审’。不是的。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应该知道的——我读了那么多文献——但我说不出来。”

这三段笔记，是L在田野期间最接近于“栖身于未知”的时刻。他从田野回来后，在整理笔记的过程中反复回到这三段——他在每一段的页边上都加过几行字，试图重新描述、重新分析。第一段他加了一句“可能是‘边界叙事’？不对”。第二段他加了一句“情绪？情感政治？——不，太笼统”。第三段他什么也没加——他只在那行“我说不出来”的旁边又写了一遍“说不出来”，像是重复这个词就能逼出一个说法。

到此为止，L的轨迹与Robbins在田野回来后反复重写日记的模式在质地上是高度接近的。他经历了悬搁，他被逼到了分析语言的缺口上，他试图通过反复重写来寻找更贴切的描述——他正在进入栖身的前兆。

5.3 制度节点的连续挤压：栖身如何被一步步逼退

变化不是在某一个戏剧性的“关键时刻”突然发生的。它是在此后两年间，被一系列制度节点连续挤压而成的。

第一道：开题报告的框架锁定。L回国后的第一学期，需要提交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开题报告。项目在田野期间就已获批，开题报告是对田野之后修订过的研究计划的正式陈述。L在写开题报告时面临一个选择：他可以把田野笔记里那些还没想清楚的悬搁写进去——这会让他开题变成一个抛出困惑而非陈述结论的方案，但这在开题场合可能会被评审专家认为“研究设计不够成熟”；他也可以把那些悬搁先收起来，用他在田野前就已确立的理论框架（族群认同与宗教变迁）来组织他的开题陈述，把田野里那些“说不清楚”的材料暂时放在“未来研究展望”里或者搁置。他选了后者。他在开题报告中写的是“本研究以建构主义族群认同理论为框架”，然后用田野里那些“能装进这个框架”的部分来举了例。那些装不进去的笔记段落——那个葬礼上的争议、那次基督教聚会上的在场经验——都没有进入。这不是L决定“放弃”悬搁的时刻。这是他在做一个合理的选择：他需要在开题中呈现“在推进”的工作，而他的悬搁显然还没有推进到可以被清晰陈述的程度。所以他把它们暂时搁下了。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暂时搁下，会成为此后一连串搁下的起点。

第二道：中期考核的阶段性成果要求。 开题后一年左右，项目的中期检查到了。中期检查要求提交阶段性成果——至少一篇或一组与新田野材料相关的、可被评审的成果。L此时公开的成果依然是博士论文的延续，田野新材料的处理还未完成。他面临一个直接的截止日期：他必须在中期检查时提交一份可以被浏览的文稿。他选择了把那个教堂聚会的材料写成了一篇文章——用来申报中期成果。但他在写的时候，没有去处理那个“不是Robbins式的自我检审”的困惑。他知道那个困惑还在，但把那个困惑写进一篇文章，意味着他必须尝试去命名那个他“说不出来”的东西——这可能需要数月的不确定摸索，而他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一份成型稿。他选了另一条路：他用一个相对成熟的分析框架（道德话语的规训功能）来处理材料，把那次教堂聚会的经验收束进一个可被综述和引用的分析脉络里。文章通过了中期检查。从制度评测来看，这是一个成功的操作。但L自己知道——他后来在访谈中说——那篇文章写完的时候，他感到“那个东西还在那里，但我没有碰它”。

第三道：非升即走的倒计时。 中期考核之后，L距离聘期结束还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他需要在这段时间内完成课题结项，并且发表足够数量与级别的论文以应对人事评审。倒计时已经不是一个背景，而是他每天打开文档时扑面而至的东西。他尝试过一次——在中期考核结束后的大约两周左右——重新打开那个基督教聚会的笔记，试图重写。他写了两页，推翻了一次。然后他在第三天放弃了。他后来在自述里写了一段话：“那几天我打开笔记，想重新回到那个场景，但我的手一直在刷新邮箱，看期刊那边有没有录用通知回来。我写不下去。我需要在这一年内至少再投出两篇，我没办法让自己坐在那个不确定里。”

第四道：最后一次悬搁的公共化尝试以及它的沉默收场。 距聘期结束大约一年前，L在一个小型的内部学术报告会上——这是他所里的例行学术活动——讲了一次。他没有讲他正在赶着发表的那几篇文章，而是讲了他田野里那个葬礼上的族群话语编码问题。他没有把它讲成“研究成果”，而是把它讲成一个他还“没想清楚”的问题。在报告结束后，讨论环节的前两个回应都是善意但标准化的：“这个材料很有意思，你可以试试用某某框架”——一位同事建议他用某个最近流行的跨学科理论。L当时点头了，但他后来在访谈中说，“他说的这个框架一看就不对。那个框架装进这个材料会把它压扁。但我没反驳他——因为他说的是标准的好意，我说‘不对’就变成我在拒绝帮助。”然后讨论就过渡到了下一位发言人。那个困惑没有被追问。它被当作一座已经被友善地给予了“建议”的雕塑，搁在了边上。此后再也没有在任何正式的学术场合被提起。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把悬搁公共化。此后直到他离任，未再有同类尝试。

5.4 不是放弃，是被挤出

L在第六年离开了那所高校——非升即走评审未通过。他转行去了一家智库，不做田野了。他的田野笔记还在他的硬盘里——那三页被他反复旁注又反复划掉的笔记是三个没有闭合的开口，停在那里。

回顾L的六年，很难在任何一个单一节点上说，“就是那件事让他放弃了栖身于未知”。开题框架收束本身不是致命伤——很多学者在开题后都经历了框架的打破与重构。中期考核的收束操作也不是不可挽回——一篇用标准框架写成的中期成果，事后可以被推翻。但问题在于，这些节点不是孤立的。它们像一连串的滤网，每一道滤网本身都留下了可以通过的开口（你可以在开题之后修正，你可以在中期之后重回试探），但在一个倒计时不断逼近的整体背景下，一个学者每通过一道滤网，他的精力、时间、心理上的安全余量就被消耗掉一层。他可以用中期考核后的那两周去试探——但那两周对他的评聘倒计时来说，是永远不会还回来的两周。当他在第三天放弃重写、转回他更有把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那篇标准操作时，他不是“选择放弃悬搁”和“选择继续栖身”之间自由地做了前者——他是在一个不断逼近他的倒计时压力下，被耗尽了继续栖身所需的安全余量。

栖身于未知的终止，不是某个时刻的决定。它是安全余量被逐年消耗殆尽之后，那个栖身空间自己塌缩了。

六、反驳、边界与延伸

6.1 “他们是幸存者”：关于选择效应的反驳

一个有力的反驳是：Robbins及其同侪的成功，是否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西方学术制度中的“幸存者”或“精英”？在那个年代的美国人类学界，同样有大量青年学者因为无法在tenure-track上存活而离开学术界。那么，本文把Robbins的轨迹当作“制度条件支撑栖身于未知”的证据，是否犯了用幸存者反推制度条件的错误？

这个反驳提出了一个合法的警示——Robbins的案例不能被当作那个年代美国学术制度的平均样本。他所享有的条件——精英研究型大学的长周期评聘、充沛的外部研究基金、高密度的顶尖同行网络——确实不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美国人类学者都能享有的。用一个幸存者的轨迹来代表整个制度生态，在方法论上是不成立的。但本文对Robbins案例的使用方式，并没有做“他是美国制度的典型代表”这一推断。本文使用Robbins案例，是要从事一个更有限且精确的工作：萃取日常化闭环的生成逻辑。要追踪一个闭环是如何转起来的，需要选一个它确实转起来了的案例——这不等于说那个案例所处的制度生态中所有学者都能让它转起来。这就像研究鸟类的飞行机制，需要选一只确实在飞的鸟——这不等于说那片天空里所有的鸟都能飞。本文的论证逻辑是：Robbins的案例展示了让悬搁日常化需要哪些条件，而对中国学术制度的分析展示了这些条件如何被系统性压制。两者之间的对照，不是“美国vs中国”的粗粒度制度比较，而是“闭环转起来vs转不起来”的生成机制对照。即便Robbins在同时代美国同行中属于幸运的少数，那也不影响从他案例中萃取的条件的有效性——它

只是提醒我们，在分析时不能把美国的学术制度整体当作一个均匀地支撑栖身的理想型。这一点，第二章已经做了自反性的交代。

6.2 “反惯习的实践”：回应布尔迪厄的挑战

第二章在与布尔迪厄“惯习”概念对质时，已经论证了“栖身于未知”是一种反惯习的实践。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一个更进一步的考虑：如果栖身于未知是反惯习的，那么它是否也发生在布尔迪厄自己的理论逻辑内部——作为一种被场域中的特定位置（例如，已经被充分授予象征资本、因而可以从产出压力中部分豁免的资深学者）所支撑的策略？换言之，反惯习本身是否只是另一种更隐蔽的惯习？

这个追问是有道理的。确实，在场域理论中，拥有足够象征资本的行动者可以策略性地打破常规——但这种“打破”本身，仍然是服务于巩固或转换其在特定场域中的位置。Robbins的栖身于未知是否属于这种情形？他在重返书斋后享有不短的沉默期，这个沉默期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可能确实在于他所在院系对他作为一个“有潜力的年轻学者”的初期信任——这种信任本身就是他在学术场域中所拥有的初始资本的一部分。但关键在于：这种资本支撑的不是一项“看起来反常规但实际仍是惯习”的行动，而是一项在行动者内部持续制造张力、要求他反复对抗自己最熟练的专业本能的实践。栖身于未知的“反惯习性”不在它的外部形式（不发表），而在它的内部质地——它是在拒绝那个催促你“用你最熟的那套分析语言把田野材料漂亮地收束、发表、积累资本”的内在倾向。这不是老练玩家才能玩的资本游戏——这是任何级别的玩家只要进入这个状态，就会在自己身上感到的对抗。资深学者也许因为资本充裕而更容易撑住这种对抗（不那么担心沉没成本），但这并不改变对抗本身的质地——它仍然是一种反惯习的实践，而不是一种更高级的惯习。

6.3 其他学科的映射：历史学、社会学与文学研究

本文的论证集中于人类学——因为伦理转向的传播损耗是本文的经验入口。但“栖身于未知”及其日常化条件的被掐断，很可能是一个比人类学更普遍的现象。以下做一个简短的、提示性的映射，不展开详论，但为后续研究指向可能的方向。

在历史学领域，那种在大量史料面前“悬”住、不肯用一个现成的解释框架去覆盖材料中的缝隙与矛盾的工作方式，与Robbins的栖身于未知在质地上高度接近。一个研究明清地方司法档案的历史学者，面对数百份互有矛盾的案卷记录，感到任何一种单线的“司法实践如何运作”的叙事都无法同时容纳这些矛盾——这种感受就是悬搁的触发。而他能多长久地栖身在这个不确定中、拒绝用一条漂亮但漏掉矛盾的主线来收束整本书的叙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行的评议文化是否容许他“在论证中展示那些未被收编的残片”——而这又取决于他在写这本书时，是否有一段被容许的、不被催促的写作周期。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各类人才计划的周期同样在塑造着学者能容忍不确定性的上限。

在社会学领域，悬搁的触发场景可能不在田野，而在数据——当一个定量研究者发现统计模型中反复出现的异常值或残差，暗示着一个现有理论无法容纳的机制时，这就是一次悬搁的触发。但这个悬搁能不能被日常化——她能不能花时间去一组更细的质性追踪去琢磨那个异常机制，还是被迫把这个异常放在“研究局限”里一笔带过——取决于她未来的学术产出压力有多大、她所属的学术共同体是否看重且奖励这种“追到问题根部”的工作习惯。

在文学研究领域，悬搁发生在批评家面对一个作品、感到所有现成的批评话语都无法捕捉它的质地、从而被“逼停”的时刻。这种被逼停的状态能不能持续到让批评家重新锻造一套解读语言，取决于制度是否给予他一段不必急于产出常规批评文章的时间。

以上三个领域的映射，目的不是论证“栖身于未知的日常化被掐断是一个普遍危机”，那需要更具体的经验研究。映射的目的是提示：本文的框架可能具有超出人类学的可迁移性，但它需要后续研究者在其各自的学科中重新找到属于那个学科自身的经验入口——就像本文在人类学中找到了伦理转向的传播损耗、找到了Robbins的教堂发抖一样。

6.4 可被检验的预测与本文的边界

本文的论证，最终凝缩为一个可以被检验的预测。如果本文的框架是成立的——即栖身于未知的存续依赖于五个条件的闭环运转，而中国学术制度通过挤出、切断、封锁三效应使这个闭环停摆——那么，在那些任何一个条件被局部重建的中国学术微生境中，我们应该能观察到“栖身于未知”作为一种学术实践开始在年轻学者的工作中留下可被识别的文本痕迹。具体来说：如果存在一个以长周期、非正式研讨为核心的工作坊或读书会，在其中年轻学者可以定期抛出自己田野中的困惑而不必将其收束为“成果”——那么，在参与者的公开发表论文中，我们应该能观察到以下特征：分析段落中出现更多试探性句法（“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但另一种可能是……”“现有的框架在此处存在一个未能覆盖的缺口”）；研究方法自述中出现更长篇幅的“方法论悬搁”描述（而非标准化技术罗列）；田野材料与理论之间的不贴切张力在正文中被保留（而非在修订中被删除）。

这个预测的检验，可以由未来的经验研究者来完成——在文献计量层面，可以通过对比参与和不参与这类微生境的学者的论文文本来进行。本文不能完成这个检验，因为本文的任务是提出框架、追踪闭环、命名概念、呈现案例，而检验需要一项不同设计的经验研究。

同样，本文不声称中国的学术制度是铁板一块、毫无缝隙。在每一个层级——院系文化、研究所传统、特定导师的工作方式——都可

能存在局部的、暂时的庇护空间，在这些空间中，某些学者仍在以极高的个人代价维持着微弱的栖身。本文的分析框架非但不否认这些缝隙的存在，反而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追踪它们的切口：去找到那些在中国学术制度中成功地日常化了悬搁的学者（无论他们是哪个学科的），然后反向追踪他们的案例——他们所在的制度微生境，在哪些环节上修复了本文所追踪的被掐断的闭环？那些修复是体制性的、可复制的，还是高度个人化的、依赖于某个特定庇护者的偶然存在？这个反向追踪，是本文框架在经验上自我修正的最重要的路径。

结论：一个等待被修正的判断

本文从伦理转向在中国人类学的传播损耗出发，命名了一种被日常化的悬搁栖身状态——“栖身于未知”，并追踪了它的发生条件与制度掐断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核心判断：伦理转向在中国丢的不是某一套理论或方法，而是让学科感应得以被日常化地培育的制度通路——中国学术制度通过挤出效应、切断效应和封锁效应，使“栖身于未知”这一实践形态所依赖的闭环无法运转。

这个判断本身，是生成机制式的：它不是在诊断一种“制度病”，然后给出一个“回归正确状态”的方子。它是在追踪一项实践如何在一套特定的制度力场中，它的发生条件被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掐断——而掐断的后果，不是“学者们变懒了”“理论被误读了”这些表面症状，是一整个学科感应的日常化能力的萎缩。这个后果无法通过“更好的理论引介”来修复，因为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也不能通过“学者们更有勇气地坚持悬搁”来修复——当一个学者尝试栖身于未知的制度代价被提到了危及职业生存的高度，“勇气”这个词就变成了对结构暴力的美化。出路不是回归某个理想化的学术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本身也有其不平等的前提），而是诚实地承认那些制度安排对一项不可被命题化的实践所产生的挤压，并在每一个可以松动的地方寻找重组的可能——那怕是局部的、微小的、依赖于某个特定工作坊或某个导师庇护的可能。

最后，本文的判断是否成立，最终不取决于它的论证是否自洽，而取决于它能否被未来的经验研究所修正或推翻。如果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在中国学术制度中发现了栖身于未知被成功日常化的清晰案例——不是孤例式地依赖某个特殊个人的天赋或某个偶然庇护，而是呈现出一种可以被描述、被分析、甚至被部分复制的制度微生境——那么本文的一些具体论断就需要被修正。如果在那些成功的案例中，研究者对日常化条件的组织方式与本文萃取的闭环模型有实质不同，那么本文的模型就需要被扩展或重设。一个理论在面对反例时能够被修正，恰恰是它区别于教条的标志。本文的最终立场，不是一个被论证完成的结论，而是一个等待被事实检验的命题。它欢迎被反驳。它愿意被更好的研究所覆盖。

参考文献

- （按出现顺序排列。凡无法核实具体出处的，列明能确认的基本信息；涉及人物思想而无需具体版本的，引其广为人知的核心文本以作参照。）
- Robbins, J. (2004). *Becoming Sinners: Christianity and Moral Torment in a Papua New Guinea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igon, J. (2011). "HIV is God's Blessing": Rehabilitating Morality in Neoliberal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idlaw, J. (2002). "For an Anthropology of Ethics and Freedom."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2), 311-332.
- Mahmood, S. (2005). *Politics of Piety: The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eminist Subje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高鹏 (2024). "波-粒错位：伦理转向在中国传播的结构性困境." 中国人类学学会年会会议论文.
- Bourdieu, P. (1984). *Homo Academicu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English translation: P. Collier (tra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aid, E. W. (1983). "Traveling Theory." In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ats, J. (1817). Letter to George and Tom Keats, 21, 27(?) December 1817. In H. E. Rollins (ed.),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814–182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Husserl, E. (1913).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Halle: Max Niemeyer. English translation: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 Kersten (tran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引其核心命题，不具体到页码。)
- Collins, H. (2010).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阎光才 (2011). 《精神的牧放与规训：学术活动的制度化与学术人的生态》.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熊丙奇 (2014). 《高校“项目制学术”批判》. 《探索与争鸣》. (具体期号未能核实，此处列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的真实出处；如无法确认，可改为指涉该学者广为讨论的核心立场。)